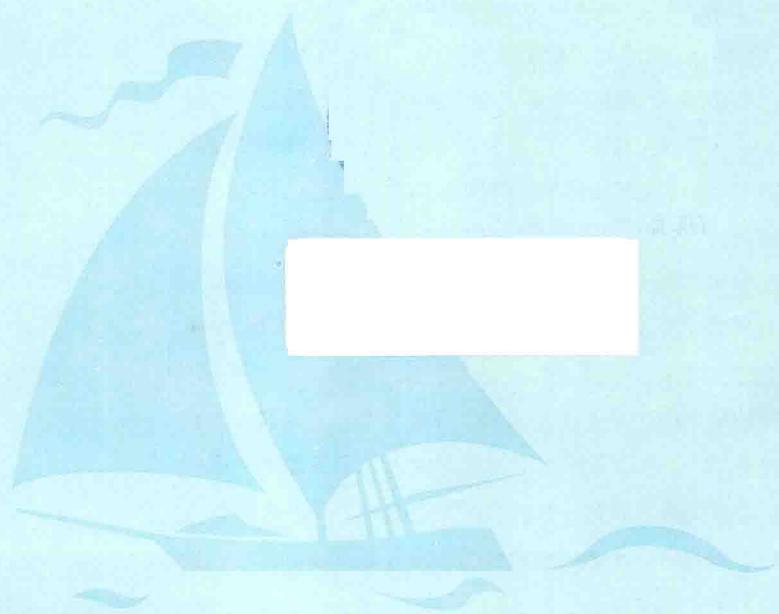




这些年，我特别希望，也特别在意，把理性的东西、理性
的精神带到我所去过的地方。

—— 郑杰

郑杰的后校长生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郑杰的后校长生活 / 教师月刊编辑部编 .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7
ISBN 978 - 7 - 5675 - 2372 - 2

I . ① 郑 … II . ① 教 … III . ① 中小学 - 学校管理 IV . ① G63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73103号

郑杰的后校长生活

主编 李永梅 林茶居

责任编辑 程晓云

审读编辑 杨 坤 卢凤保

设计 钱今言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网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邮购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邮编 200062

网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1000 16开

印张 8

字数 150千字

版次 2015年6月第一版

印次 2015年6月第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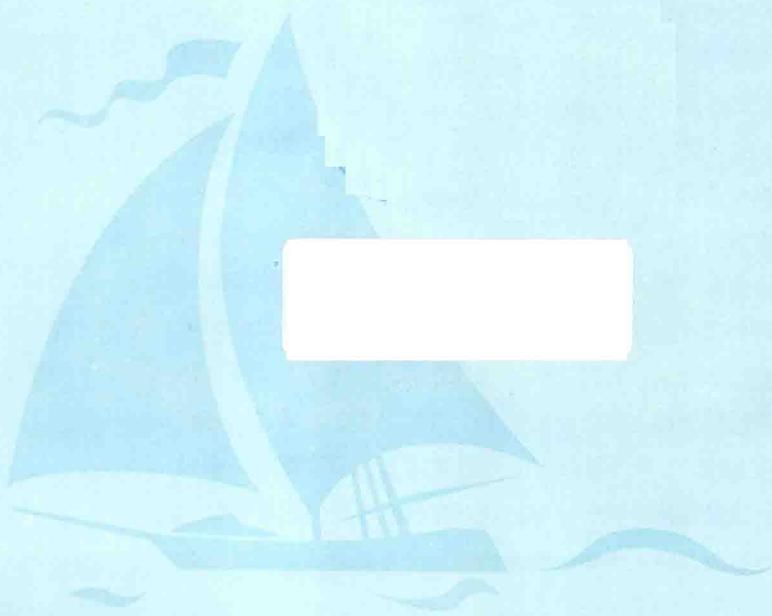
书号 ISBN 978 - 7 - 5675 - 2372 - 2/G · 7545

定价 16.00元

出版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郑杰的后校长生活



我可以称之为“阅读教育学”吗

文_林茶居

记得小时候，有几种人，大人们都叮嘱，要称作“先生”：教师，医师，风水师（及算命者、卜卦者等）。教师的天职是教书育人，医生的责任是救死扶伤，而风水师被认为拥有通天知地的本事。对于乡民来说，他们都是高人，甚至代表着乡村文化的形而上部分。这是乡村文化对身体、对文字、对知识、对命运、对自然、对未知深怀虔敬的一种展露。

在我的语言体系中，与海誓山盟、化敌为友、雪中送炭、济世安邦一样，与落红护花、江河入海、潮起潮伏、月圆月缺一样，教书育人、救死扶伤、通天知地，也都是世界上极为伟大的事情。当然，语词并非独立产生意义，其精神意蕴来自人（物）与之构成的“互文”关系，即人与词（物与词）相互确认、相互敞开、相互照亮。比如，教师与“教书育人”，医生与“救死扶伤”，是彼此映证、互为因果、荣辱与共的。当“教书育人”、“救死扶伤”的现实内容被抽离或发生变异，教师、医生的社会形象必然受损；当教师、医生的职业行为有悖本分，“教书育人”、“救死扶伤”就可能被解构或发生意义坍塌——社会舆论中将“诲人不倦”戏改为“毁人不倦”，便是明证。

再把意思集中到教师身上，必须看到，同为教书育人，常有天壤之别。有的教书育人，教的是课本之书、教材之书、应试之书，育的是身心不全的人；有的教书育人，教的是生命之书、社会之书、天地之书，育的是“内在人性道德”、“外在人文伦理”（李泽厚语）键合融通的人。不少教师，同时也是人之父、人之母。如果偏执于职业一端，就可能视前者为“正常现象”；如果加入了“父”、“母”的视角，那么一般会认为后者才是真正的教育、良善的教育。

当今世界，最大的危机正从人对自然的破坏上，逐渐转移到人对机器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依赖上。“自然神”常常以灾害的方式提醒人类要保持敬畏感，而“机器神”总是以“新生活”的名义消弭人类的警惕心。网络空间的广场效应，往往与反智、反常识相伴随。在这种情况下，信息越多，遮蔽越多，遗漏越多，而理性越少，共识越少。其结果是观念鸿沟和价值真空的大面积出现。这是国际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所面临的共同困境。

我也注意到一个大趋势：国际社会对人的阅读素养日渐重视。且不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先后启动于1995年和2001年的“世界读书日”、“世界书都”项目。2006年，德国开始实施“阅读起航”项目，基于儿童成长的三个关键节点，建立分别以儿科医生、图书馆管理员、学校教师为主体的儿童阅读促进体系。2010年，美国颁布了涵盖学前到十二年级数学、英语课程的《共同核心标准》，此外还有一个《各州英语语言艺术与历史/社会研究、科学、技术学科读写能力共同核心标准》，强调通过整合学习，发展学生的文学文本阅读素养、信息文本阅读素养和阅读基本技能。2012年，欧盟相关专家组发表了一份“阅读素养报告”，针对欧盟国家普遍存在“读写障碍者”的现状，提出“年龄分层干预”的理念，倡导“设置阅读教学的专业教师职位”，“每个教师都应该是读写教师”。2001年，五年一届的“国际小学生阅读素养发展评估项目(PIRLS)”开展首次测试，香港排名第十四位；到了第三届，也就是2011年，香港跃居冠军。其关键原因在于，在这个过程中，香港实施了“小学生读写计划”和“五年阅读改革计划”，其中包括将阅读作为学校的跨学科课程，强化校长的阅读课程领导力，倡导“从阅读中学习”……这是国际社会从内容、载体到手段、工具（包括运用信息技术）的积极应对。在全球化和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必须有另外的力量与之抗衡，形成文化缓冲，伸延精神张力，明晰人性走向，重组心灵土壤。

一种新的教育学在有力崛起：必须将阅读素养（读写素养）作为人的关键素养的基础和终身学习能力的支撑——我可以称之为“阅读教育学”吗？阅读本来就是一个思想命题，很多思想家都作出了自己的阐释——我相信，教育将由此而重建与时代、与世界、与未来的新型对话关系。对教师来说，其教书育人的天职，显然需要吸纳新的质素，拓展新的边界。至少，在“教书育人”的同时，有一个“读书育己”的问题。阅读素养，无需辩驳地成为教师素养和教书育人能力的重要组成，甚至是前理性构件。四

专栏 >

-
- 006 刘邦的楚歌教育实践 _ 周勇
010 你有课程风险意识吗 _ 朱永通
013 教育变革的路与道 _ 叶菊艳

封面 >

- 016 郑杰的后校长生活

人物 >

- 040 诗人 诗人余秀华的越狱人生 _ 蔡兴蓉

现场 >

-
- 053 记事 小凯 _ 黄丽金
“癫痫”就在楼下 _ 周宇节
075 发现 生命教育的植物疗法 _ 熊和平
077 论坛 柳夕浪笔谈评价改革（三）
学生综合素质怎么评
084 海外 南希·艾特维尔：“全球教师奖”首奖得主
_ 汪明帅
090 德育 没有一个多余的学生 _ 李建华
093 课堂 那一个神奇的“点” _ 陈惠芳
095 吴非说 就是要让你“接话”

097 朱永新答 创造更好的自己

话题 >

099 身边的好同事（二）

“大将”张小兵_王栋生

“老人家”刘朝权_王蓉芳

乡村教师老杨_于永军

阿汤_张文娟

阅读 >

107 知慚愧斋微博_王尚文

人文 >

116 苏格拉底的教育天命_刘艳侠

123 废墟_于坚

视窗 >

057 校园 无锡市安镇实验小学

062 读书会 厦门外国语学校“素书社”

064 家 幸福就好_郭武松

066 报道 “大夏书系读书节”：行走江苏，聚会香坊

070 大夏 做幸福的好教师

刘邦的楚歌教育实践

文_周勇

周勇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提起春秋以来的诗歌教育，人们很容易想起孔子整理的“诗三百篇”，以及他的诗课“标准”：“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但孔子的“诗”教，取材多为北方诗歌，南方诗歌即楚歌则很少。从孟子那里可知，孔子曾听过楚地孺子唱“浪沧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并以之来教育学生：无论环境清浊，君子皆可以自适、自持。

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春秋战国时期，有诸多民间楚歌曾传唱于大江南北，《孺子歌》便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越人歌》，系南方少女唱给意中人的歌，其词曰：“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古时的南方少女为了能与意中人短暂同舟，虽可以不顾一切，但在表达爱慕时终究难免矜持与含蓄。从专心成就霸业的江湖英雄，到性格浪漫的文人士子，都喜欢这类由浓郁真情汇成的楚歌。甚至可以说，楚歌是他们必须学好的基本课程。春秋战国时期，不断出现动人的楚歌景观，甚至连年幼的乡野孺子及前线普通士兵都会唱。

无数楚歌景观中，最著名的是霸王项羽败走垓下，夜闻四面皆楚歌。“大惊”的项羽觉得运势已去，于是对着不离不弃的美人虞姬慨然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此等楚歌场景本已令人心碎，记录它的司马迁却还要加上一句：“歌数阙，美人和之。

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仿佛史家当时也在现场，要把自己看到的一切都告诉后人。

同样广为传播的便是屈原抒发个人悲愁的楚歌演出：“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归来兮，不可以托些。”如此等等，皆是至今不绝的名作。

只可惜，即使今人知道春秋以来连乡野孺子、出身贫寒的士兵都能早早学会楚歌，也很难知道他们到底接受了什么样的楚歌教育。一般的教育史教科书叙及春秋战国时，都只讲述孔孟、老庄、墨子、孙子等人的教育遗产。民初的教育史教科书是这样，今天的教育史教科书仍是老调重弹，未将楚歌纳入考察视野——尽管楚歌是春秋战国时期非常流行、社会各阶层都很接受的文化教育“课程”。

教育史教科书中没有楚歌的一席之地，是因为人们的教育视野及观念太狭隘。这一点尚容易克服，真正困难的是，即使有心要去刻画春秋以来的楚歌教育实践，也很难找到充裕的史料。以地位可与《诗经》并列、西汉时期整理的楚歌作品集《楚辞》为例，其内容主要是屈原、宋玉等士子文人的楚歌作品，以及楚歌被其改造成“楚辞”后呈现出的士人楚歌（如《阳春》、《白雪》等）与大众楚歌（如《下里》、《巴人》等）之显著分野，看不到屈原曾以楚歌做过什么样的教育。

西汉时期是春秋楚歌得以整理、流传的关键阶段，但整理者显然是推崇屈原、宋玉的士子文人，以至连打下江山的西汉士兵所喜欢的楚歌都不收录，更不要说会看重乡野孺子及前面提到的那位南方少女喜欢的楚歌了。不过，即使整理者具有“平等”的文化视野，愿将各路楚歌列入“楚辞”，其文人笔法也只会将重心放在作品筛选上，而不会考察记录屈原、项羽有过什么样的楚歌教育实践，以及乡野孺子、南方少女受过什么样的楚歌启蒙教育。

还好，在汉代这一文献整理的关键阶段，除文人笔法外，还有司马迁、班固等史家笔法。正是这一善于四处搜寻事迹的史家笔法，为后人了解春秋以来的楚歌教育提供了不少生动的素材，也使得本文可以尝试勾勒一下刘邦的楚歌教育实践，看看刘邦喜欢何种类型的楚歌，他用楚歌做了什么教育，以及为什么要做楚歌教育。

如司马迁所叙——

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招故人之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以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

这一言简意赅的叙事，让人们得以完整地看到一幅难得的楚歌教育景观。

很明显，作为底层草莽英雄，刘邦喜欢的是粗犷、充满豪情的楚歌，而不是屈原、宋玉的“楚辞”。后一类楚歌，按宋玉所论，追求的是“曲高和寡”，比如必须会用“高亢的商音”、“慷慨的羽音”，再配上“流畅的徵音”，只有少数几个人会唱，即所谓“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比小众的《阳春》、《白雪》还要“高档”。刘邦或许不知此类士子文人的楚歌议论，但即使知道，也会嗤之以鼻，以为无用，因为他有自己的楚歌标准，即一定能让左右的老少大众明白他的心志。

按司马迁所记，刘邦起兵时最喜欢说的话是“天下苦秦久矣”、“父老苦秦苛法久矣”等。及至登上皇位，他也希望身边大臣能“直言情”。就此而言，刘邦其实也是一位诗人。只是他不会修饰曲调歌词，更不会只让少数几个人知道他的心志。相反，他必须争取更多的人理解他，否则便无法动员大众，并让大众接受他。而刘邦也的确掌握了一套既能表达其心志，又能让大众明白其心志的大众楚歌本领，其体制句法十分简单，即蔡彦峰所谓“主要采用‘××××兮×××’及‘×××兮×××’两种句式”。

当中的“兮”字至关重要，它“最有能力构成诗的节奏”（林庚语）。只要“纵酒”至心志兴起，刘邦便能用这些简单的句式与节奏，创作出类似《大风歌》的大众楚歌。总之，刘邦不仅有自己喜欢的楚歌类型，而且可以即兴创作楚歌。但真正有趣的还不是刘邦的楚歌风格与创作能力，而是他作为汉代开国皇帝，竟刻意从事楚歌教育——它并非表现为从制度入手建立楚歌教育体制，而是进行活生生的个人楚歌教育实践，即教导家乡后辈子弟学唱楚歌，尤其是学他即兴创作的《大风歌》。

这是一次异常真挚感人的即兴楚歌教育实践。从中可以看出，刘邦当上皇帝后，最大的担忧是汉代江山会像前朝那样迅速崩溃，因此他希望家

乡父老和那 120 位特意挑选出来的家乡后辈学子能够明白他的担忧与祈求。无疑，刘邦是在“谆谆教导”，乃至为此“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尤为动人的是，他教完了，唱完了，哭完了，还要对父老乡亲说，他这一生奔波来去，虽然连皇帝都做了，但内心深处最留恋向往的还是家乡。

一句话，无论从形式来看，还是就内容而言，刘邦皆称得上为后世留下了一堂真挚感人的楚歌音乐课，其中之好，很值得今人细细品味。笔者写作至此，也忍不住要喊一声“好课究竟是怎样炼成的”，进而追问一下：什么场合，对着什么样的学生，教师可以淋漓尽致地表达深藏已久的心志，从而也能来一次刘邦式的教学体验，即像刘邦那样，将心志托付给如故旧一般可堪信任的学生，并为能有这样的教学与托付感到心满意足……

之所以会有上述追问，其实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刘邦有过一次精彩的楚歌教育实践。然而正如此前提到的那样，将楚歌整理成“楚辞”的西汉士子文人并不欣赏先帝刘邦的大白话楚歌，他们推崇的是屈原、宋玉。既然如此，不妨想象一下，如果让这些被推崇的楚歌精英来教楚歌，他们能教出什么？

屈原可能做出什么样的楚歌教育，一点线索都找不到。至于宋玉，《楚辞》中倒是有一则记载。当时楚襄王问宋玉：“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士子百姓说你不好呢？”听到这一质问，宋玉来了一段高深的楚歌议论，说如果有谁在都城唱《下里》、《巴人》，一定会有数千人与之合唱；如果唱《阳春》、《白雪》，会有几十个人合唱；如果以“商音”、“羽音”、“徵音”唱的话，就只有几个人能理解了。

宋玉所言看上去也是一次楚歌教学，但其目的却是为自己辩护，以凸显自己是“鸟中之凤”、“鱼中之鲲”，一般“世俗之民”根本无法理解他。这是何等盛气凌人，难怪草民出身的刘邦不喜欢他们。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曾言：“吾以为凡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不为虚生此国。”对于梁氏的爱国主义文化裁断，本文当然表示欣赏，但同时也担心其中难免有宋玉式的文化偏见，忘了“楚辞”不过是士子文人的楚歌，乡野孺子、前线士兵等凡夫俗子同样也能唱出动人的——甚至境界更高、情感更好的楚歌，刘邦的那堂楚歌课就由这些民间楚歌孕育而成。

你有课程风险意识吗

文_朱永通

朱永通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福建策划部主任

前不久的一天，凌晨两点左右，我起床去洗手间，发现女儿房间虚掩着的门透出灯光。莫非忘了关灯？我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往里一看，小家伙还没睡呢，正趴在床上，头从拱形的被子里探出来，看上去像一只小骆驼。我好奇地问：“怎么还没睡呀？”女儿抬头：“几点了？”只见她双眼布满了血丝。我这才发现，女儿的枕头上放着一本书，已经看了一大半。原来她一直在趴着看书。我问：“什么书这么好看，读到不用睡觉？”女儿说：“《看见》。”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拿过来一看，果然是柴静的《看见》。我让女儿赶紧睡觉，自己带着书到客厅，睡意全无，一心想着明天怎么跟女儿聊这件事情。

第二天早餐时，女儿告诉我，前一天语文课，陈老师花了近一节课的时间介绍柴静的纪录片《穹顶之下》，下课时，又借给同学们两本《看见》，让大家轮流看。女儿抢先得到书，所以要尽快看完，再把书传给其他同学。我问：“书里的内容你看得懂吗？”女儿说：“不是很懂，晕晕的。”我笑笑，没说什么。女儿毕竟刚上七年级，说多了，估计会更晕。

没想到，中午放学，女儿一进门，就兴奋地说：“爸爸，我们政治老师播放《穹顶之下》给我们看了。”我问：“一节课看得完吗？”女儿说：“所以嘛，我中午要接着看，老师说了，不仅要看，而且要记住一些东西，期中或者期末考试时，他很有可能考里面的内容。”我欲言又止，从 iPad 上搜出《穹顶之下》，让女儿接着看。

两天后是周末。晚上，女儿坐在餐桌前，一脸愁容。我问：“怎么啦，

没胃口？”女儿说：“不是，今天下午信息课，老师让我们看《穹顶之下》。大家说已看过一半了，他就播了剩下的部分。”我故意说：“这不是很好吗？”女儿愤然说：“好什么好呀，计算机老师要求我们每人交一篇500字以上的观后感！”看来，有必要和女儿谈谈《穹顶之下》，谈谈雾霾，谈谈柴静了。

我问：“看了《穹顶之下》，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女儿答：“太可怕了，太恐怖了！”我说：“大部分同学的反应和你差不多吧？”女儿点点头，接着说：“这几天厦门一直是雾天，同学们天天喊，又是雾霾天，太恐怖了！”我问：“你怎么知道是雾天，不是雾霾？”女儿笑了，说：“透过云朵，还可见到蓝天，还有，有风一来，云会走。如果是雾霾，哪来的蓝天，云怎么会走？”我狠狠地夸了女儿会独立思考后，继续问：“你们除了觉得可怕，有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女儿说：“没有呀，对了，现在我们年段每个班都有四五个同学坚持天天戴口罩上学。”

我苦笑，看来，这个结果是老师们万万想不到的。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当社会热点作为教育资源被引进课堂，已经在无形中成了潜在的课程。不同的课程输出不同的知识，进而塑造不同的人生。也就是说，每一位教师都应有课程意识，充分认识到课程对学生一生的深远影响，所以，既要认识和发扬课程积极、有益的一面，也要警惕和避免课程消极、有害的一面。这一点，容后再谈。

我接着问女儿：“你读了《看见》，看了《穹顶之下》，有什么感想？”女儿想了想，慢慢地说：“我觉得柴静太厉害了，她作了那么多反映社会黑暗面的采访，但说实话，《看见》这本书，我还是看不懂。《穹顶之下》呢，拍得太感人了，尤其是开头，但后半部分，我就不怎么看得进去了，那么多数据，感觉有点无聊，有点烦人。”

女儿的回答，大致在我的判断范围内。我问她：“你知道吗，现在还有很多中国人每天中午吃的是黑鸡蛋和黑馒头。”女儿睁大眼睛，大声问：“什么？黑鸡蛋和黑馒头？”我认真答道：“是的。煤矿工人每天早上下井，中午就在井里用餐，晚上才出井。他们带的干粮就是馒头和鸡蛋，里面没有水洗手，吃午饭的时候，鸡蛋剥开，就变成黑的，馒头也是。对他们来说，吃黑鸡蛋和黑馒头不算什么，他们最大的心愿是，每天晚上能回到家中，看到老婆、孩子，跟他们一起在餐桌上吃饭。他们为什么要吃黑鸡蛋、黑

馒头，要去做时刻都有可能付出生命代价的工作呢？”

女儿若有所思，静静地看着我，似乎在等我说下去。我继续说：“爸爸也很佩服柴静，她和她的团队所作的努力很有意义，这个纪录片水平之高，远远超出我的意料。但这个纪录片走的是感情叙事的路子，太容易感人，太容易传递情绪，太容易把人们的关注点套牢在感性层面上，忘记了雾霾问题不是简单的‘私人恩怨’，而是一个复杂的公共课题，它关系到每一个活生生的中国人，比如煤矿工人，以及更多类似他们的人。如果真的像片子所说的，‘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治理雾霾’，这种冲动式的决策，很有可能让更多的人付出生命的代价！面对雾霾问题，不能盲目讲道德、讲情感，更要讲理性！”

女儿的眼神告诉我，她对我所谈的内容似懂非懂，尽管我已经绞尽脑汁，想办法说得通俗易懂。不管怎么说，这次谈话至少让女儿意识到，任何一个问题都不可能孤立存在，应把它放到事物的具体情境和普遍联系中进行考察、思考。

回到前面提到的课程意识问题。除了潜在的课程，学校里更多的是显性课程，它既包含传授学科知识的国家课程，也包括学校研究、开发的校本课程。我所谈的课程风险意识，主要就潜在的课程和校本课程而言。毫不夸张地说，现在几乎是有学校的地方，就有校本课程。问题是，在开发校本课程时，很多学校往往缺乏课程风险意识。

就我有限的观察和思考，校本课程至少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风险。

一是，价值导向的风险。女儿小学时上了一年收藏课。刚开始的几个月，女儿常常问，我们家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然后翻箱倒柜地找。有一次，她好不容易找到一些看似有“文物价值”的东西，兴冲冲地带到学校，结果悻悻而回。原来老师告诉她，这些东西不值钱。我为此和她深谈，最后达成“共识”：收藏是为了向艺术致敬，向美致敬，不是为了增值，为了钱财。我由此担心，要是其他同学误以为收藏是为了挣钱，并从此迷上，对他们以后的人生，究竟是福是祸？

二是扼杀个性的风险。学校的校本课程都是“师本化”，即教师有此爱好或能力才开设，却没有从学生的角度权衡，没有考虑学生的兴趣差异，往往容易变成学生的心智负担，从而扼杀其个性。

教育变革的路与道

文_叶菊艳

叶菊艳 博士，现任职于教育部普通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每年都会去各区县进行调研或支教，有那么两条路，至今印象深刻。

一条路由某镇中学通往公路。全长不到三百米，坑坑洼洼，可把坐在车上的我们颠簸坏了。想下车走，却很是泥泞。加之公路边不好停车，必须把车开进学校。学校里也没有像样的操场，恰逢学生在进行五十米测试，也只是在有限的一点水泥地上画定了一个“跑道”。见到该校的教师后，更感到心疼：精神面貌普遍不好，甚至看起来有点营养不良，黝黑的脸上深嵌着无神的眼睛。不论问什么情况，他们都是抱怨之辞：“学生太差”、“越来越难教”、“教师收入太低被人看不起”、“教育不受重视”、“资源太少”、“没有培训机会”、“不少教师离职到广东打工”……

其中，提及资源少时，校长还专门拿门前的路做例子，说这条路这样的状况已长达十年，一直没人管。因为路不好走，一到下雨天，学生和教师就头疼，不爱来学校。当我问及为什么不索性发动学校师生或家长动手解决时，校长表示这不可行。但他却无法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不可行。

时隔半年，我到另一个省的贫困县调研，见到了另一条让人印象深刻的路。这条路连接着该县一所村小的大门与公路，大约有六百米。这是一条非常干净的水泥路，两边种满了当地的特色植物。这次，我们把车停在了路口，步行至学校，带我们考察该校的乡教办主任边走边向我们介绍两边绿植的名称。

这反差也太大了！我忍不住问起这条路的来历。教办主任很自豪地说，

是他带领该校教师自己修的，路边的植物亦是他和教师们上山挖来种上的，除了修路的原材料花了一点钱，没有用一分钱的人工费。在他看来，通往学校的必经之路如果不好，很难让学生喜欢学校，如果学生不爱来学校，还谈得上什么教育呢？

进入学校后，我更是为操场上成片的芒果树和桂圆树而震惊。教师们显得自信大方，我们围坐在树下的石桌旁，一起吃芒果与桂圆。那个场面至今想起来仍然很美好。

我们共考察了该乡的三所学校，每所都有自己的绿化特色和办学特色，而这些全是乡教办主任带领校长和教师们一起动手的结果。教办主任说，“人无我有，人有我特”是他指导各校文化建设的宗旨。他负责的 24 所学校，每所学校都根据自己所处的地域和文化构建了自己的特色。与很多人只是在办公室看报、喝茶不同，这位教办主任几乎每天都泡在学校里，在这个过程中，小学教师出身的他练就了一身泥水功夫，且精通园艺。

两条不同模样的路，背后却站着三种不同的教育工作者：一种以“等靠要”的方式被动应对时代的变化，认为自己所遭受的一切是外界的责任；一种则积极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参与变革，甚至引领变革；还有一种，也参与变革，但目的却是增加个人的筹码，为自己谋福利，这体现在第一所学校中老师们口中所言的“远走高飞”的人身上。

教师如何界定自己的工作和看待自己所承担的角色，会直接影响其行动，并构建和重构社会现实。我们通过两条不同的路，看到了两所学校的差异：一边毫无生气，留任的教师唯有通过怀旧为自己继续从教获得一点意义；另一边则呈现出一片勃勃生机，学校成为凝聚师生和村民的中枢，教育者亦从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感。这不由让我再次抛出这样的问题：学校教育真的是社会转型的“受害者”吗？我们可否通过学校教育创建一个新的社会秩序？

我想，这取决于教师自己的信念。随着社会的快速转型，变革可谓一种“新常态”。我的学术偶像，九十多岁高龄的齐格曼·鲍曼索性提出“流动的现代性”这一概念，以形容当今的时代。这个时代变化实在太快，快到很多东西来不及沉淀和制度化，更新的东西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涌现了。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试图依靠某位超人来引领变革是完全不可行的，因为